

赵遐秋
主编

乡土意识与爱国主义

台湾
乡土意识

大家

台海出版社

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

——乡土意识与爱国主义

赵遐秋 主编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赵遐秋主编. - 北京:台海出版社, 1999. 11
ISBN 7-80141-108-0

I. 台… II. 赵… III. 乡土文学-文学研究-中国-台湾
IV. I 209.95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4510 号

●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

主 编 赵遐秋

责任编辑 谢 香

印 刷 北京永生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125

字 数 18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台海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甲 36 号

邮政编码:100009

电话:010-62387035

ISBN7-80141-108-0/G·39

定价:12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凡我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序

这部《台湾乡土文学八大家》书稿，从台湾文学中乡土文学这个层面切入，以八大家为注重点，阐发了台湾现当代文学发展中的爱国主义传统。

在这里，我想从这八大家引发开去，进一步探讨一下与爱国主义传统相关的文化反思的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这个“伟大”，表现在民族的素质、秉赋、性格、行为、作为、历史的建树、对人类的贡献，等等方面。其中，有一点，值得我们自豪的是，我们的民族富有强烈的自省精神。尤其是，面对着危机，或者度过了劫难之后，都能在尽可能深广的程度上反思自己的过去，反省自己的问题，从这种反思和反省中得到警醒，获取再前进、再发展的动力和参照坐标。这种反思和反省，最深沉之处，到达了民族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或者说，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民族文化的反思。本世纪以来，现代中国人一直在进行这种反思。大陆上的中国人在进行，台湾地区的中国人也在进行。作为社会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文学理所当然也被人们用作这种文化反思的工具、武器，用作这种文化反思的一种学术载体。而文学之中，又以小说最为突出。这一点，大陆和台湾都一样。

现代台湾小说作文化反思，是从台湾新文学开拓之初就开始了的。

受大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兴起的台湾新文学，虽然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环境作用下，带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艺术风貌，也在屡遭殖民者侵蚀的历史背景和日益高涨的民族运动的时代环境作用下，打上了深刻的历史和时间的印记，却还是作为祖国大陆文化的延伸和分支，保存着祖国文化的巨大而又深刻的影响，具有了新文化启蒙运动的性质，承担了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任务。而当时，在小说里，一个普通的主题，就是把抗争的矛头指向日本殖民统治和封建制度。

人称台湾新文学初期“三杰”的赖和、张我军、杨云萍，贡献了台湾新文学中的第一批白话小说。其中，赖和作品最多。赖和的《一杆“秤仔”》写镇西威丽村靠耕作谋生的佃农秦得参一家的悲惨的故事，控诉了日本殖民统治者“查大人”及走狗——为虎作伥的台湾警察“补大人”。他的《不如意的过年》，解剖了一个日本警察既贪婪又残暴的占领者的卑鄙心态。《可怜地死了》写阿金被卖作童养媳、姨太太，结果受尽糟蹋后落水身亡。这也都是血泪的控诉。杨云萍的《黄昏的蔗园》借文能的口对着日本占领者发出了“决不”“做牛马”的呐喊，表现了台湾人民反抗意识的觉醒。

在发出这种控诉、抗争的声音的同时，赖和他们也深深忧虑于人民大众的不觉醒，而发出了鲁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怒的悲叹。赖和在《丰作》里写的蔗农添福，自私自利，胆小怕事，任人宰割。《惹事》里写的那些农民，向

环境妥协，不去反抗那位“大人”，这都表现了作家对民族的病态性格——奴性的无情鞭挞。

像鲁迅一样，赖和的小说还描写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的临阵脱逃和灰心颓丧，揭示并批判了这些人的空虚与妥协的心态。《棋盘边》、《赴了春宴回来》等都是这一类知识分子精神颓唐的卑污灵魂的写照；张我军的《诱惑》和杨云萍的《光临》，也都和赖和的小说异曲同工。

这就是一种文化反思。台湾小说一开始就注重到，在弘扬民族传统文化，通过反对日本统治者和封建势力讴歌民族的优秀品质和美好的人格理想的同时，一定要注意国民的劣恨性的诸多病态的揭示和批判。这无疑是一个好的传统。

二

开拓起步以后的台湾新文学，从1927年到1937年，经历了十年左右的一个发展时期。在这段时间里，台湾新文学运动始终是台湾同胞抗日爱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一部分。其间虽有曲折，到30年代中期，终于迎来了台湾新文学运动的高潮。小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有了长足的进步，在赖和、张我军、杨云萍之后，又有了杨守愚、陈虚谷、蔡秋桐、杨华、朱点人、王诗琅、杨逵、吕赫若、龙瑛宗、张文环等一大批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趋于成熟的作家。他们陆续发表了不少颇有影响的作品。

杨守愚写《升租》、《移溪》、《凶年不免于死亡》、《谁害了她》、《赤土与鲜血》、《女丐》、《过年》一类的作品，表达了他对日据时期工农大众苦难生活、悲惨命运的深切同情与关怀；写《十字街头》、《鸳鸯》一类的作品，是他对日本占领者及其

走狗的阴险狡猾、卑鄙凶残本质的无情揭露；他写《醉》、《元宵》、《嫌疑》、《决裂》、《一个晚上》则真实生动地描绘了台湾人民的觉醒和走向反抗与斗争。杨守愚写人民大众的“不幸”，不再是“怒其不争”了。杨华、朱点人，还有张文环、龙璞宗等人，都曾着力表现重压之下台湾人民的坚毅性格，颂扬了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光辉。

日据时期的台湾作家，除了对日本殖民者的残暴凶顽深恶痛绝，还普遍地对民族败类，对那些御用走狗的阿谀、谄媚，义愤填膺。蔡秋桐的《保正伯》就鞭辟入里地刻画了他们的卑污灵魂。陈虚谷还由这些走狗而涉及到一些甘当日本顺民的奴才的卑下心态。陈虚谷写《放炮》批判那个老牛，写《荣归》批判那个再福和再福的父亲。写再福的父亲在演说里恬不知耻地叫嚷什么“愿我子孙，竭其愚诚，勉为帝国善良之民，以冀报恩于万一”。他这个爱国作家的心是在泣血！朱点人的小说在这方面也有上乘之作。除了再现异族统治下台湾同胞的痛苦生活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多侧面地表现了台湾人民不甘当亡国奴的民族正气外，还不遗余力地嘲讽和批判了奴颜卑膝的民族败类及守财奴们的道德的沦丧。《脱颖》里的那个陈三贵，《安息之日》里的李大粒，都是这样的标本。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作家杨逵的小说，早就被台湾同胞赞誉 为“指标历史进路的文学”，是为生活在黑暗中的人们点燃心上一盏灯的文学。他写《送报夫》，赋予杨君以坚强的理想主义色彩；写《模范村》、《泥娃娃》、《鹅妈妈出嫁》，通过阮新民等人物展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必败、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光明前景；写《春光关不住》，让小说主人公林建文象征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压不扁的玫瑰花”，他的小说成

了这个时期全方位的文化反思的一块里程碑。

三

抗战开始以后，直到台湾光复，随着“战时体制”的确立和“皇民化运动”的推行，日本侵略者对台湾的殖民地迫害更加疯狂，台湾新文学运动进入了极为艰难的阶段。创作，只能在艰难中前行。

在小说方面，这一时期，影响最大的是，吴浊流、杨逵、吕赫若，龙瑛宗、王昶雄、叶石涛等人也有作品问世。

吴浊流被台湾文学界赞誉为“铁血之魂”。他的小说，着重反映的是日寇铁蹄蹂躏之下台湾知识分子复杂的生存状态和文化心态。如果说他写《水月》、《功狗》，表现的只是知识分子的无奈，只是他们在外国强权者的淫威下逆来顺受的软弱性，而他写《先生妈》和《陈大人》，在劣迹斑斑的主人公钱新发和陈英庆身上，则表现出来的就是一般的“皇民化”了的知识分子的堕落了。还有《波茨坦科长》里的范汉智，《狡猿》里的江大头，也都把这种民族败类的丑恶嘴脸展示得一览无余了。吴浊流作文化反思，历史感和现实性最为厚重的，是他的《亚细亚的孤儿》。这部小说，正像吴浊流自己说的：“透过主人公胡太明的一生，把日本统治下的台湾，所有沉淀在清水下层的渣滓，一一揭露出来了。”登场人员有教员、医师、商人、老百姓、保正、模范青年、走狗等，各阶层的人都网罗在一起，无异是一篇日本殖民统治社会的反面史话。

四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台湾回到祖国怀抱，

台湾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台湾文学跨入了其发展的当代阶段。

开始，文坛相当沉寂，除杨逵、吴浊流等人继续以日据时期的生活经验从事创作外，大陆一批作家先后赴台，却也少有创作问世。到国民党政权去台，反共的“战斗文学”出现，台湾文坛又一次面对了沉重的危机。《赤地之恋》、《秋歌》、《华夏八年》、《旋风》、《重阳》、《蓝与黑》等一批小说进行了反共欺骗宣传。到50年代后期，这种文学难以为继，终于盛行起一种“乡愁文学”或者“怀乡文学”、“回忆文学”来。

这是一种来自于“对家乡和往事固执的怀念”的独特的“民族文学”。其普遍的意绪是“老家回不去了”的“身在异乡为异客”的“无根”的焦灼。于是，怀念原乡故土，向往故园亲人，渴望回归故里，思念落叶归根，成了小说的主题。

一方面，像在北京长大的林海音，写《城南旧事》，对儿时生活的北京充满了刻骨铭心的思念；流亡来台的聂华苓，写《失去了金铃子》，对故乡湖北的山川风物人情世态充溢着切切的情思；还有於梨华的《梦回青河》，白先勇的《台北人》，聂华苓的《台湾轶事》，等等写的都是去台人员的乡愁。小说里的主人公都得了思乡的重病，全都渴望有一天能回老家，全都唱着浪子的悲歌，全都表达了那一代断了根的人回归故土的心声。

另一方面，钟理和、钟肇政等作家，沿着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的步履，踏上了寻根追源，敬宗睦族的道路，写作了寻根的乡愁作品。钟理和的短篇《原乡人》，直呼出了“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的愿望。钟肇政的《浊流三部曲》表现出了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新生活的追求。《台湾人三部曲》以

“插天山之歌”为心声，告诉世人，只有祖国和祖国的人民，才是作家心中真正的插天之日。

在这种文学氛围中，60年代初期的留学生文学里，於梨华、丛甦、张系国、白先勇、欧阳子等人，把乡愁带到了海外。当着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飘洋过海，踏上新大陆，理想与现实发生尖锐的矛盾时，美梦幻灭，精神失落，又陷入了失根的迷惘之中。这些海外浪子的困境，很快成了於梨华等一批旅居海外的作家关注的题材。于是“浪子的悲歌”式的放逐主题，在留学生的小说里大量出现了，这成了台湾乡愁文学的一个分支。其中，於梨华写《又见棕榈，又见棕榈》，把一个年天磊推上了到处找不到归依的位置。这使於梨华成了“无根一代的代言人”。丛甦的《想飞》等作品，则进一步表现了海外游子渴望回归祖国的迫切愿望，到张系国，《昨日之怒》直接写到了1971年旅美学生的保钓运动，通过这一运动中各式各样人物的活动和表现，还有这一运动的发展、分化和瓦解的过程，表现了作家对整个民族大业和国家命运的思考。

就在这股乡愁文学的潮流向前推进的时候，在台湾，现代主义文学流行了起来。有意思的是，现代派的小说家们虽然都在追求反叛传统，探索心灵、寻找自我、讲究技巧，却有不少作家的作品，继承了现实主义的文学传统，真实地描述了祖国大陆和台湾留美学生的生活，也唱出了一曲又一曲的“浪子的悲歌”。比如，聂华苓又写了《桑青与桃红》，让“桑青”或者“桃红”式的失掉“根”的漂泊者，替作家自己倾诉孤独、苦闷、彷徨和精神上的痛苦。

五

就在现代主义文学剧烈地冲击台湾文坛的时候，陈映真举

起了“乡土文学”的旗帜。1959年，他发表了短篇小说《面摊》，显示了“乡土文学”的破土而出。随后，陈映真、黄春明、王禎和、王拓、杨青矗、李乔等也都相继发表了作品。到70年代初，乡土文学终于成了气候，战后台湾的第二代乡土文学作家终于布成了阵，取代了现代派，成为台湾文学的主流。

举起了“乡土文学”旗帜的陈映真，自己又成了台湾“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从1959年的《面摊》到1965年的《将军族》，陈映真描写的是台湾社会转型期间小知识分子，面对家庭和个人的沉落，滋生了沮丧、彷徨，充满了感伤的情调。1966年发表的《最后的夏日》，1967年发表的《唐情的喜剧》、《第一件差事》、《六月里的玫瑰花》，表明陈映真对社会现实有了更深刻的反映。1968年火烧岛集中营遭牢狱之灾，促使他的生活与创作发生转折，从此，陈映真的小说跨进了一个新的时期。出狱以后，陈映真通过乡土文学的论争，进一步看到了台湾“一部分人心中产生的所谓‘中国历史的孤儿’、‘弃儿’和‘受害者的意识’”，爱国的精神和民族主义的热情。1978年以后的《夜行货车》、《上班族一日》等等，进一步对资本主义工商社会下异化问题作了探讨。

陈映真笔下的人物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他写社会，更较重于挖掘社会在人物心灵上的投影，挖掘这些投影怎样成了个人无尽痛苦的根源。于是，他写的人物，总是为自己，也为历史反思和反省。这中间，大陆人与台湾人之间的省籍矛盾，微妙关系，成了特有的主题贯注在作品里，这便是“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之争，“统一”与“独立”之争。通过不断地反思、反省，作家通过笔下的人物，呼唤着祖国的统

一。台湾有的评论家说，陈映真写出了在台湾的多数中国人，没有“根”、“两脚腾空”的悲哀。

六

70年代以后，“新生代”作家涌入文坛。80年代初有宋泽莱、曾心仪、洪醒夫、季季、姚嘉文、古蒙仁、吴念真等作家。

其中，堪称“新星”的宋泽莱，以1976年发表的《打牛浦村》为代表作，不再停留在表现农村的凋零凄怆的惨景上，而是关注于当代农民的历史命运了。曾心仪一步入文坛就彻悟到：它不再是装饰生活，不再是消遣，而是一种使命，为人们说话，说出痛苦，说出愿望。他的获奖小说《我爱博士》，犹如一把利刃，剖开了常博士等的无耻嘴脸。

这里需要加以指出的是，从80年代初开始，出现了一个“台湾文学本土化”的问题。原来，早在1977年，叶石涛的《台湾乡土文学史导论》提出以“台湾意识”作为台湾文学的前提条件，立即遭到陈映真的批评。陈映真指出，叶石涛没有能够以中国为民族归属。可见“台湾结”与“中国结”的冲突早就存在了。1981年，詹宏志发表《两种文学心灵》一文，加速了台湾文学本土化的推进。随后，叶石涛在1982年发表《台湾小说的远景》，提出“台湾文学是居住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建立的文学”，应该发展富于“自主性”的小说。彭瑞金则认为，“本土化”是凝聚这块地域上的文学的关键所在，台湾文学应以“本土化为首要课题”。

这种见解，还是首先遭到了陈映真的批评。陈映真说，主张“台湾人意识的文学”，正是一种“台湾文学的分离运动”，

这个运动，“又其实是这个岛内外现实条件在文学思潮上的一个反应而已。”

这种分歧，一直延续到了90年代。1993年，台湾召开六场地区性的文学会议，会上就提出了用“台北中心”取代“北京中心”的主张。事实上，分离主义的倾向在部分文学家那里还在发展。

人们可以感到欣慰的是，面对这种分离主义倾向，又是陈映真为代表的文学家，深深地把“根”扎在了中国文学、中国文化的土壤之上。

在这样一种思潮的冲击下，80年代以来，台湾描写两岸情况的作品还是有了崭新的内容。青年作家莘歌的一些作品，就描写了一个个跨越海峡两岸长期隔绝的典型的家庭伦理悲剧，传达了台湾同胞突破人为的政治障碍实现亲人团聚的强大呼声。陈映真的《铃铛花》和《山路》，还超越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对民族的命运作了更广阔更深刻的思考。

在1984年，青年作家吴锦发发表了《叛国》，被台湾文坛认为是继承了《亚细亚的孤儿》的传统的杰作。宋泽莱在1985年发表的《废墟台湾》则更是未来与现实结合的群体命运的思考了。

七

我在上面粗略地回顾了一下台湾小说几十年来进行文化反思的情况。我认为，这种反思有着如下的六个特点：

第一，台湾小说能作文化反思，首先源于这些小说家饱经忧患之后自觉地肩负起了神圣的历史使命和严肃的社会责任，充满了忧患意识。从赖和、杨逵到陈映真，他们中的不少人历

尽劫难，因而能够义不容辞而又无可畏惧地直取国人性格中那些病态的特征，努力加以开掘，找到它的病根。

第二，不管每一个时期这种反思的具体内容有什么不同，也不管不同的作家作品在反思的深广程度上有什么差别，但是，这种反思，从赖和、杨逵到陈映真，都是在最深沉的层面上，即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上，民族的文化心理积淀上作反思。反思的焦点，就是挖掘民族性格中那些不健全的、病态的东西，毫不留情地予以揭露和批判，加以扬弃。其目的，则是重铸我们的民魂，这一点，可以说，从赖和、杨逵到陈映真，都是继承和发扬了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的光荣的战斗传统。

第三，这种反思，都具有强烈的民族性，民族意识渗透在整个创作之中，而成为创作里的一种坚不可摧的内在因素。只是，从赖和、杨逵的反抗日本殖民者的残暴统治，到陈映真强烈的“一个中国”的中国情结，每前进一步，都赋予了新的历史内容。这固然来源于台湾和大陆的历史因缘、文化血缘，也来源于作家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的爱国情操。无论是正面颂扬正义与光明，还是无情鞭挞丑恶与黑暗，作品都是在尽可能包蕴并且有意识地传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

第四，这种反思，都是在“乡土文学”式的传统的民族艺术形式上进行的，不仅是反思的作品主题努力适应民族心理的期待，而且，从赖和、杨逵到陈映真，反思作品的艺术形式也是努力与民族的审美心理相契合的。

第五，尽管在早期，在赖和那一代作家身上，还欠缺一些哲理的思考，理性的思辨的色彩还没有尽量地呈现出来，但是，到了陈映真这一代作家，这种反思就闪现了作家们睿智的光彩了。台湾评论家说，陈映真是台湾小说家中“最可以深探

其思想、其哲学的作家”，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第六，随着眼下台湾文学中“分离主义倾向”的出现、蔓延，以及就此而展开的思想论战，我相信，这种文化反思还会进行下去。事实上，眼前也正在进行下去。

赵遐秋

于北京育新花园

目 录

- 赖 和 台湾新文学的伟大奠基人** (1)
1. 志士拥有兴亡恨 (3)
 2. 心血虽干亦自啼 (13)
- 张我军 在台湾拉开新文学的大幕** (21)
1. 先驱者·铺路者 (23)
 2. 破旧者·立新者 (30)
- 杨 逵 压不扁的玫瑰花光彩夺目** (51)
1. 春光永远关不住 (53)
 2. 首阳园中放异彩 (61)
- 吴浊流 铁和血和泪铸成的男儿汉** (75)
1. 六百万民齐蹶起 (77)
 2. 同心来复旧山河 (84)
- 钟理和 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 (99)
1. 倒在血泊里的笔耕者 (101)
 2. 执著耕耘着笠山农场 (108)

吕赫若	他把台湾文学带进了当代	(121)
	1. 冷静客观地审视人生	(123)
	2. 一位思想型的小说家	(129)
陈映真	蕴含振聋发聩的思想力量	(139)
	1. 忧国忧民忧天下	(141)
	2. 步履未倦夸轻翩	(184)
黄春明	他在回眸乡土中审视历史	(203)
	1. 发扬了五四文学传统	(205)
	2. 随着时代变化而变化	(226)
结束语	(235)